

百年以来的中国俄国史研究

张 广 翔 周 嘉 滢

〔关键词〕 俄国史研究；改革开放；现代化理论；改革；革命

〔摘 要〕 中国俄国史研究日趋繁荣，尤其在改革开放以后，成果数量大幅增加，选题更为广泛深入，史学理论更新及时，中外交流日益密切。随着现代化理论的引入，俄国现代化研究成为中国俄国史研究的主流趋势。中国学者不仅关注古罗斯起源问题，还热衷于探讨亚历山大二世改革、工业化、农业发展水平、村社制度、城市化等问题，借以挖掘俄国三次革命的根源。虽然中国俄国史研究已取得可喜成就，但依然存在很多局限，学术积累不足，研究课题集中，人才培养形势不容乐观。中国俄国史学科的发展，需要国家和学者的共同努力。

古代中国典籍对俄国的风土人情和相互往来就有记载^①。17 世纪中期，俄国开始入侵中国黑龙江流域，有关中俄关系的档案文献汇编陆续涌现^②。鸦片战争后，随着列强侵略步伐的加快和“西学热”的兴起，有关俄国的文献记载尤其是侵华战争史逐渐增多，如林则徐《四洲志》、魏源《俄罗斯盟聘记》和《海国图志》、何秋涛《朔方备乘》等。以上著述一是描述俄国通过有利地理位置侵略、蚕食中国领土的行径，使国人警惕和防范俄国；二是出于“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国”的考虑，认为“经营于耳目之前，而收效于数十载”，“俾知两朝圣人御边柔远”^③，无疑能加深清政府对俄国的了解程度，使中俄外交关系问题得到较好解决。随着中日甲午战争和列强瓜分中国狂潮的到来，很多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走上“寻求真理”和“救亡图存”的道路，并将目光投向了北方近邻，《时务报》《清议报》等相继刊发俄国蚕食中国领土的文章，王树枏、康有为关注彼得一世改革。从总体而言，在 20 世纪以前，国内俄国史“研究”基本处于译介俄文书籍、介绍俄国风土人情和对外战争并为政治造势的阶段。

中国俄国史研究真正起步，要从 20 世纪说起，大致可分为 4 个阶段^④。

一 概 观

1. 1949 年以前的俄国史研究。

20 世纪初，学者们在关注中俄关系史的同时，有感于“彼得之业震烁古今”，而欲求“其立国之道与强大之所由来”^⑤，便充分利用语言优势，翻译伊罗瓦伊基《俄罗斯史》、山本利喜雄《俄罗斯史》等著作。1917 年，这位北方近邻先后爆发两次国内革命。二月革命后，虽然两种政权同时并存，但沙皇制度覆灭，国家由专制变为共和，还是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孙中山对这次革命赞赏有加，直言俄国政变“将牢不可破之专制国，一举而倾覆之，……与中国作佳邻焉”^⑥，并开始以友好态度对待新“共和国”。几个月后，十月革命胜利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性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建立的消息传到中

① 俄国史是指俄国从远古到十月革命的历史。此外，祝蓓、于沛、张广翔、姚海、张建华、王晓菊、王新等国内学者已对中国俄国史研究作过学术史回顾。鉴于本研究综述涉及学者和成果众多，注释尽量从简。

② 吕一燃：《清代和民国时期的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述评》，《黑龙江社会科学》2000 年第 6 期，第 35～39 页。

③ 魏源：《海国图志（下）》，岳麓书社 1998 年版，第 1479 页。

④ 俄国外交史是俄国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俄关系史还是国内研究的热点，鉴于学科划分的复杂性、成果的多样性，对其不作单独论述。中俄关系史研究进展，可参见宿丰林、黄定天、吕一燃等学者的相关论文。

⑤ 伊罗瓦伊基著，商务印书馆重译：《俄罗斯史》，商务印书馆 1903 年版，“序”，第 1 页。

⑥ 《孙中山全集》第 4 卷，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114 页。

国,举国上下一片震惊。中国学界和政界很快掀起亲苏热潮。1920年,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创办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孙中山也于1926年年初正式确立“对外之联俄政策”。

结果,1917年俄国革命的两声炮响,不仅为中国共产党人送来马列主义、为中国国民党人送来革命理念,而且吸引了中国学者的关注。山内封介的《俄国革命运动史》、史列泼柯夫的《俄国革命史(1905~1907)》均被译介,朱枕薪、杨幼炯、金兆梓、陈复光等均自行编写俄国革命史,介绍俄国革命大致经过,方颐朴还在《俄国富源》一文中分析俄国得以成功的自然优势。不过,直到1930年代,中国学者对俄国历史进程的研究仍处于早期摸索中。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俄国史研究逐渐发展,研究机构和学术杂志出现,论著数量增加,内容也相对丰富。早在1929年,何汉文便创办《俄罗斯研究杂志》。之所以将1930年作为分界线,一是因为学术氛围相对开放自由,著作突出学术性和专业性;二是1930年俄国史研究专门机构俄事研究会在南京成立,《俄罗斯研究》也由此创办,开启了俄国史研究的新阶段。此后苏俄评论社、中苏文化协会、中苏文化杂志社陆续创办,并出版《苏俄评论》《中苏文化》等杂志^①。研究成果仍集中于俄国革命史和通史,译著有波克罗夫斯基、范伦斯基、托洛茨基等的俄国革命史,蒲律托诺夫、迈斯基、佛那次基等的俄国通史,以及普列汉诺夫的《俄国社会思想史》。中国学者以俄国学者成果为基础,经过多年的学术积累,有能力自行编写教材,主要有宗华的《俄国革命史概论》,以及姜壮行、顾谷宜、何汉文、陈廷璠等撰著的俄国通史。

这一时期研究有了新的现实意义,主要受当时中国国内政治局势的影响,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早已超过学术本身。随着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和大革命的失败,十月革命后俄国政治和社会组织的突变吸引了中国政客和学者的关注。当时有人将苏维埃视为“理想国”,有人将其看作“洪水猛兽”,姜壮行便认为必须仔细考察苏联成立和革命过程才能区分真实与传说^②。日本侵华步伐的加快,也成为俄国史研究的新契机。中日战争爆发后,孙科、陈廷璠等高举民族主义大旗,希望举国团结起来给日本沉重打击,免遭侵略和屠杀,获得自由和幸福^③。苏联建国成就和内战胜利经验是很好的借鉴,欲了解其背景就必须探本求源、溯及往史。

这一时期的研究也为后来埋下隐患。中国俄国史研究从模仿苏联史学框架起步,然而苏联史学研究局面十分消极。苏联初期史学不仅否定革命前成果,还僵化、片面解释和应用马克思主义。1930年代苏联又兴起新史学运动,批评革命前乃至革命后俄国历史著作^④,其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影响尤为深远。由于特殊的政治气候,苏联史学意识形态色彩浓重,学术禁区较多。从苏联学者首批著作问世到1990年代,苏联史学基本围绕“斗争”主线展开,对中国学者尤其是留苏学者产生深刻影响。

2. 1950~1977年的俄国史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首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中方建立了良好的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关系。因此,全面向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学习具有重要意义,历史研究则被视为揭示其经验和教训最为有效的工具。

直到1960年代前期,中国俄国史研究在人才储备、学术机构和研究成果方面均呈良好发展态势。国家为了培养专业人才,向苏联派遣留学生;中国人民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聘请苏联学者讲授俄国史课程。朱寰、李建、夏景才、张蓉初、刘祖熙、孙成木、陈之骅、陈启能、徐天新、郑非凡等第一批学者,均有在国外或国内学习的经验,学成后担负起俄国史和苏联史的教学和科研重任。

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和苏联东欧研究所陆续成立,《历史问题译丛》《史学译丛》《民族问题译丛》等专业翻译杂志相继创刊,围绕俄国资本主义形成与发展、农民经济、农

① 黄立菲:《20世纪中俄民间组织的合作与中俄关系》,《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4期,第97~98页。

② 姜壮行:《俄国史》,中华书局1935年版,“自序”,第1页。

③ 何汉文:《俄国史(上)》,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序”,第1页;陈廷璠:《俄国史(上)》,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自序”,第1~2页。

④ 何汉文:《俄国史(上)》,“自序”,第1~2页。

民战争、封建主义、1905 年革命等问题,刊发大批苏联著名学者的成果。苏联学者著作也被大量译介,张蓉初等人翻译 A. M. 潘克拉托娃三卷本《苏联通史》。其他著作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有关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著作,包括 И. И. 梁士琴科《苏联国民经济史》、Ф. Я. 波梁斯基《苏联国民经济史讲义》、П. А. 札依翁契可夫斯基《俄国农奴制度的废除》等;第二类是有关俄国 1905 年革命和工人运动的著作;第三类是人物传记,如 A. 亚尔莫林斯基编《维特伯爵回忆录》等。《历史研究》《史学月刊》《史学集刊》《历史教学》等现今主要史学杂志也在当时创建,为学者提供了广阔平台。中国学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关注俄国革命史,围绕 1905 年革命和十月革命、十二月党人起义、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农民战争等问题共发表约四十篇论文。不过,新中国成立后学者处于学术摸索中,研究存在明显问题,受国内政治环境和苏联史学模式双重影响,“以论代史”现象尤为突出。

自 1966 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俄国史研究基本陷入停滞状态。在此期间,中苏意识形态出现分歧并最终走向分裂,对俄国史研究产生很大影响。自 1972 年起,学者以影射苏联侵略行径为目的,揭露俄国历史上的侵略暴行,强调俄国兼用武力威胁和外交手段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攫取大片领土。

1978 年前的俄国史研究,是特殊历史时代的产物。虽然研究方法、内容和学术观点存在明显不足,但学者们为俄国史研究的学术积累做出大量贡献,俄国史研究正是在这一基础上逐渐走向繁荣。

3. 1978~1989 年的俄国史研究。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之风吹进俄国史研究领域。改革开放政策提供了宽松的学术环境,随着中苏关系的改善,中国俄国史研究步入新的发展阶段。

在这个阶段,因“文革”停办的研究所均恢复工作,上海苏联东欧研究所、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以及吉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兰州大学、黑龙江大学等高校苏联研究所纷纷成立。人才培养情况逐渐好转。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1978 年北京、甘肃、陕西、黑龙江等地的高校均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的俄国史研究生,1980 年代中期又开始招收博士生;1984 年,随着中苏文化教育交流的恢复,中国又重新向苏联派遣留学生。第二批俄国史学者成长起来,同活跃在科研和教学一线的第一批学者,构成俄国史研究的主力军。在杂志方面,《世界历史》《社会科学战线》《国外社会科学》《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俄罗斯研究》等纷纷创刊,《史学集刊》《史学月刊》《历史教学》等因“文革”而停办的杂志和学报陆续恢复,一同成为学者展示最新成果的学术阵地。

译介成果大幅增加,围绕俄国革命史主线,集中介绍 И. И. 斯米尔诺夫、М. В. 涅奇金娜、Д. 阿宁、С. Ю. 维特、М. К. 卡斯维诺夫、Н. 弗列罗夫斯基、В. В. 别尔维、М. Н. 波克罗夫斯基等俄苏学者的有关农民战争、十二月党人、十月革命、工人阶级等问题的著作。与此同时,计量史学和社会学方法、现代化理论等外国史学理论也被引进,Н. Д. 科瓦里钦科《计量历史学》、Б. Н. 米罗诺夫《历史学家和社会学》、西里尔·E. 布莱克《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等译著,拓宽了中国俄国史学者的研究视野,并最终在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产生极大影响。

研究成果也有很大突破。最有代表性的当属由刘祖熙、孙成木、李建主编的《俄国通史简编》。该书汇集了当时国内多名俄国史专家,除三位著者,还包括王钺、阮大荣、李显荣、张蓉初、徐天新、部彦秀、陶惠芬、谢有实等,他们广泛吸收和参考苏联、中国乃至西方学界最新研究成果,注重俄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沙皇制度演变等问题。此外,还有孙成木、李显荣、康春林合撰《十月革命史》,王钺《〈罗斯法典〉译注》,李显荣《巴枯宁评传》和《托洛茨基评传》,陈之骅《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和《克鲁泡特金传》等。论文选题广泛深入,在质和量上均显著提高。中国学者在 1978~1989 年间共发表约二百四十篇论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考察古罗斯起源、资本主义发展史、改革和革命史、对外关系史,具体包括彼得一世、亚历山大二世、斯托雷平改革、农民战争、十二月党人起义、军事帝国主义、俄国三次革命、土地制度、村社、民粹派、普列汉诺夫等问题。虽然学者们力求客观,但“以论带史”现象依然存在,大量使用社会形态、规律、阶级等词汇。该时期成果还有一显著特点,即有关俄国侵华史成果大量涌现,这与“文革”结束至 1989 年中苏关系正常化期间中苏关系的现实情形密切相关。

这一时期有一件学术上的大事值得一提,那就是现代化理论的引入。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现代

化理论在西方逐渐形成,后被广泛应用于历史研究当中。历史学家希冀通过这种手段解释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俄国国内采用这一研究范式的时间略晚,1980年代末学者才积极研究这种社会变革,并逐渐认为运用现代化理论解释俄国历史进程切实可行^①。国内学者接受这一理论则介于两者之间。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现代化大潮席卷中国沿海沿江地区,现代化研究也由长期被拒于国门之外转而成为国人共同关注的课题。在1985年召开的“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第一届年会上,俄国史组成员重点讨论现代化问题^②。此后,以现代化理论阐释俄国历史发展进程逐渐成为俄国史研究的主流趋势。

4. 1990年代以后的俄国史研究。

1990年代以后,随着中俄稳定战略伙伴关系新格局的形成,苏联解体后档案的全面开放,外国史学理论的相继引进,研究队伍的壮大,中俄学术交流的加强,中国俄国史研究水平突飞猛进。

学术机构作了调整并不断壮大。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俄罗斯东欧史研究室和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历史与文化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经调整后成立,同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苏州科技学院、南开大学、兰州大学、黑龙江大学、黑龙江省和吉林省社科院等高校和机构一起,为学者提供了良好的研究平台。

中外学术交流密切。一方面,中国学者赴俄罗斯进行学术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俄罗斯科学院、莫斯科大学等机构签署交流协议,互派人员往来,马龙闪、吴恩远、黄立蓓、张广翔等还在国外史学杂志发表学术见解^③。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苏州科技学院等科研机构 and 高校常常邀请俄国学者前来讲学。吉林大学在这方面表现突出,自2001年起聘请Л. В. 米洛夫、В. В. 阿列克谢耶夫、С. П. 卡尔波夫、Н. М. 阿尔辛季耶夫、И. В. 鲍别列日尼科夫、Л. И. 鲍罗德金、А. Н. 梅杜舍夫斯基、В. Н. 米罗诺夫、С. А. 涅菲奥多夫等四十多名俄国一流学者讲授俄国经济史、政治史、社会史课程,并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建立了正式学术交流关系。

人才培养工作形势好转。各级社科基金资助项目的创立,为研究人员提供了良好的研究条件。与此同时,研究队伍完成新老人员交替,第一批学者退居二线,吴恩远、李春隆、张广翔、黄立蓓、赵士国、黄定天、姚海、张建华、曹维安、罗爱林、白晓红、杨翠红等第二批学者,活跃在科研和教学的一线,担负起培养人才的重任。进入21世纪以来,张宗华、许金秋、王绍章、郭响宏、叶艳华、李桂英、郭宇春、吴贺、姜喆、唐艳凤、袁丽丽等第三批学者逐渐成长。目前,吉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西北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和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等高校和科研机构,均有能力培养俄国史方向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为俄国史研究输送后备力量。

译介成果数量大幅增加,涉及俄国历史的方方面面。其中,“苏联丛书”反映了俄苏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文化等方面的基本概况;“俄罗斯思想文库丛书”丰富了俄国思想史的研究资源。其他优秀成果还包括,俄国学者В. О. 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В. Н. 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和《帝俄时代生活史》;美国学者N. V. 梁赞诺夫斯基、M. D. 斯坦伯格《俄罗斯史》,W. G. 莫斯《俄国史》,M. 拉伊夫《独裁下的嬗变与危机》;等等。吉林大学学者在译介俄国学者成果方面做出很大贡献,积极引进俄国社会史研究方法,现代化、分析历史学、人体测量学、马尔萨斯人口循环理论及运用该种理论解读俄国现代化进程的优秀成果,有助于中国学界了解俄国学界的前沿动态,及时更新研究方法。

研究成果取得很大进展。专著取材广泛,陶惠芬《俄国彼得大帝的欧化改革》和《俄国近代改革史》、金雁《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刘祖熙《改革和革命:俄国现代化研究(1861~1917)》、邵丽英《改良的命运:俄国地方自治改革史》、张广翔《18~19世纪俄国城市化研究》、曹维安《俄国史新论:影响

① 伊·瓦·鲍别列日尼科夫著,张广翔译:《俄国现代化的空间特点》,《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6期,第15~17页。

② 《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正式成立》,《世界历史》1985年第6期,第34页。

③ 于沛、周荣耀主编:《中国世界历史学30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8页。

俄国历史发展的基本问题》、张建华《俄国现代化道路研究》、王云龙《现代化的特殊性道路——沙皇俄国最后 60 年社会转型历程解析》、赵士国《历史的选择与选择的历史：近代晚期俄国革命与改革研究》、陈之骅《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等围绕俄国现代化进程展开大量讨论，赵士国《俄国政体与官制史》、李永全《俄国政党史——权力金字塔的形成》、赵振英《俄国政治制度史》、姚海《近代俄国立宪运动的源流》和《俄国革命》、刘显忠《近代俄国国家杜马：设立及实践》、叶艳华《俄国早期政党研究》等关注政治制度，金雁和卞悟《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化之路》、罗爱林《俄国封建晚期农村公社研究（1649～1861）》关注村社制度，张建华《俄国知识分子思想史导论》、戴桂菊《俄国东正教会改革（1861～1917）》、乐峰《东正教史》和《俄国宗教史》、姚海《俄罗斯文化之路》和《俄罗斯文化》、刘祖熙《斯拉夫文化》、孙成木《俄罗斯文化一千年》、白晓红《俄国斯拉夫主义》、阎国栋《俄国汉学史》、李明滨《俄罗斯汉学史》和《中国与俄苏文化交流志》等关注宗教与文化，陈之骅《俄国沙皇列传》、赵士国《彼得一世评传》、张建华《红色风暴的起源：彼得大帝和他的帝国》等注重人物研究，以及王钺《往年纪事译注》和张建华《俄国史》等。1995 年以后，具有翔实史料、科学论证和严密结构的博士学位论文大量涌现，部分论文还以专著形式出版。这些成果十分注重学术史梳理，展现出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进展。论文数量和质量十分可观，选题具体又深入，资料丰富、论证严谨。1990～1999 年学者共发表约 140 篇论文；而在 2000～2014 年达到 360 篇，主要从事俄国现代化研究，将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思想与文化史置于俄国现代化进程中，有关俄国现代化表现、水平、成因、参与力量的成果层出不穷。这些成果基本摒弃社会形态、阶级、规律等词汇，较为准确地还原俄国的历史进程、揭示历史现象的成因和影响。

以下将选取中国学者集中探讨的几个问题，展现中国俄国史研究的基本特点和最新动向。

二 古罗斯起源研究

古罗斯起源问题是俄国史研究的起点，二百多年来引起俄国学界激烈争论。自 1960 年代起，中国学者也对其十分关注，从古罗斯国家的建立与发展、名称的由来等角度考察古罗斯起源问题。

1. 古罗斯国家由谁建立。

在古罗斯起源问题上，国际学界存在“诺曼说”和“反诺曼说”两种观点，其实质是古罗斯由谁建立。中国学者最初仅以《往年纪事》为基础展开论证。张椿年、陈启能等认为，基辅罗斯的产生是几百年来东斯拉夫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结果，外来的瓦良格人掠夺、从事贸易或充当雇佣军^①。朱寰、李铁匠、孙秉莹、张爱平等则认为，古罗斯由原居住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瓦良格人建立^②。

然而，学者所依据的《往年纪事》本身就存在问题。《往年纪事》根据以往罗斯编年史、王公档案、民间传说及拜占廷等国家的史料编纂而成，但囿于原始文本未能流传，且现存史料几经抄写，记载不一，学者或将其视为传说，或将其视为历史事实甚至经典，因此，如何看待和使用《往年纪事》直接影响对古罗斯“由谁建立”的判断。涅斯捷尔和西利万斯特尔《往年纪事》均把“罗斯”等同于瓦良格人，从而断定古罗斯国家起源于斯堪的那维亚。中国学者便寻找《往年纪事》中的错误以证明“诺曼说”不成立。张椿年、陈启能（《关于古代俄罗斯国家起源的“诺尔曼理论”批判》）认为涅斯捷尔的《往年纪事》被人为修改，究其原因，一是作者企图通过这一传说制止当时基辅王公间的内讧，二是为了从历史上强调罗斯不隶属于拜占廷；西利万斯特尔整理的《往年纪事》强调留里克被邀请，以证实莫诺马赫统治基辅的合法性。这一论证无疑为古罗斯起源问题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

从词源学角度考察古罗斯名称的由来，可辅助“由谁建立”问题解释古罗斯国家起源。然而《往年纪事》在名称起源问题上记载不一，引发了支持“南方说”（Южн）与“北方说”（Север）学者长时间争论。

① 张椿年、陈启能：《关于古代俄罗斯国家起源的“诺尔曼理论”批判》，《历史教学》1962 年第 6 期，第 22～24 页。

② 朱寰：《论古代罗斯国家的起源》，《社会科学战线》1979 年第 1 期，第 176～181 页；李铁匠：《从拉夫连季〈当代记事〉看罗斯的起源》，《青海师范学院学报》1980 年第 4 期，第 67～75 页；张爱平：《从〈往年纪事〉看古罗斯国家的起源》，《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1 年第 2 期，第 19～24 页；等等。

张椿年、陈启能《〈关于古代俄罗斯国家起源的“诺尔曼理论”批判〉》认为,“罗斯”一词在人种和地域上均起源于南方,很可能由南方某斯拉夫部落名称沿袭而来,这一观点无形中推翻了“诺曼说”。李铁匠在《从拉夫连季〈当代记事〉看罗斯的起源》一文中则认为,古罗斯名称难以区分可能与“罗斯”一词的含义经过演化而完全改变有关。“罗斯”最初指瓦良格人的一支,在罗斯国家成立后含义发生变化。作为民族,它包括海外来的征服者和被征服的斯拉夫人及其他部落,最后完全指代斯拉夫人。由于《往年纪事》不够可靠,曹维安、齐嘉便利用中世纪罗斯外的史料加以分析。两者指出,“南方说”认为古罗斯国家起源于南俄第聂伯河中游一带,早在瓦良格人到达基辅前就存在“Росъ”名称;“北方说”认为“Русь”源于北方,可能是由芬兰语演化而来,最初指乘船远征的斯堪的纳维亚人,8~9世纪成为南拉多加湖地区“军事—商人阶层”。随着民族的同化,“Русь”最初的族属和社会含义逐渐消失,获得广泛的地域和政治含义^①。由于“Росъ”和“Русь”均存在于现代俄语之中,因此有关古罗斯名称由来的争论实际上并没有解决古罗斯起源问题。

近年来,随着弗拉基米尔古墓地、格尼奥兹多沃古墓群、捷灭列沃古墓地最新考古资料的出土,古罗斯起源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曹维安、齐嘉在《“罗斯”名称的起源与古罗斯国家的形成》一文中,利用斯堪的纳维亚人在东欧平原活动的遗迹,尤其是斯拉夫妇女服装的金属附件、古罗斯侍卫的武器、基辅和旧拉多加斯堪的纳维亚的痕迹、东欧主要水运干线上的墓葬,证明斯堪的纳维亚人在俄国早期历史上的存在及发挥的独特作用,强调古罗斯国家的建立必须依靠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瓦良格人、与拜占廷帝国展开广泛的国际商贸活动等外部动力。

2. 古罗斯国家如何发展。

从苏联时期开始,古罗斯国家起源研究出现新的弊病。苏联学者虽承认瓦良格人的斯堪的纳维亚来源,承认斯堪的纳维亚人在罗斯的事实,却认为古罗斯国家的建立主要是东斯拉夫人内部社会经济长期发展的结果,不受任何外来干预影响,从而撇清瓦良格人族属起源与古罗斯国家形成的关系。

中国学者对这种论证提出质疑,纷纷强调诺曼因素的作用。朱寰《论古代罗斯国家的起源》认为,古罗斯执行着瓦良格人的统治政策,依靠劫掠和贸易获得财富;瓦良格人贵族和新兴的东斯拉夫人贵族,共同构成罗斯统治阶级。11世纪中期,瓦良格人基本完成斯拉夫化进程。李爱平《〈从〈往年纪事〉看古罗斯国家的起源〉》则强调要平等看待“诺曼说”和“反诺曼说”,应将古罗斯产生的根源和形式紧密结合,东斯拉夫人和北欧罗斯人均经历漫长的发展阶段,只是通过征服与被征服的形式,东斯拉夫人统一国家形式才产生,但罗斯人是国家当之无愧的建立者。曹维安、齐嘉《“罗斯”名称的起源与古罗斯国家的形成》以古罗斯国家发展所需的内部力量不足反证,认为自然条件恶劣、地广人稀、经济分散、农业生产效率与剩余产品总量低下及南俄草原游牧民族的入侵,使东斯拉夫人内部联合困难,社会分化缓慢,结果东斯拉夫社会内部迟迟难以分化出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无法为东斯拉夫人建立国家创造充分的前提条件。

古罗斯起源问题研究易受历史和现实因素影响。由于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作祟,俄国学者往往贬低瓦良格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强调基辅罗斯光荣伟大的传统,致使结论常与编年史记载出现偏差。直到1980年代,这一情况才明显好转^②。反观中国学界,由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苏关系处于未解冻状态,因此中国学者十分关注俄国长期以来推行的扩张政策及其历史渊源,将古罗斯国家起源视为重要切入点,并批判苏联学界的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表现。这一问题如此特殊和敏感,加之相关文献和考古资料众多,争论不仅在以往长期存在,今后也仍将继续。从学术角度而言,俄中学者均应充分利用早期国家起源理论和历史资料,仔细分析两派论证的个中缘由,关心古罗斯怎样建立,无疑要比一味地争论古罗斯由谁建立更有必要。

三 亚历山大二世改革研究

亚历山大二世改革是俄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1960年代引起中国学者关注,1980年代以后逐渐

① 齐嘉、曹维安:《“罗斯”名称的起源与古罗斯国家的形成》,《历史研究》2012年第3期,第111~116页。

② 曹维安:《俄国史学界关于古罗斯国家起源问题的争论》,《世界历史》2008年第1期,第115~128页。

成为俄国史研究的热点问题,并被置于俄国现代化进程当中加以探讨。

1. 1861 年改革。

第一,关于改革的前提。

中国学者在研究 1861 年改革的前提时,多承认农奴制遭遇危机,受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克里木战败、农民运动和革命民主力量的威胁,其意见大致可归纳如下:(1)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19 世纪上半期,由于交换和贸易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在封建社会内部逐渐发展起来,封建农奴制经济日益解体。资本主义发展受到现存农奴制的阻碍;地主控制农民,造成资本主义发展所需劳动力的供应不足;地主倚靠农民,不改进生产技术和耕作方法,落后生产方式束缚农业的发展;农民生活贫困,购买力低下,造成国内市场狭小,无法为工业提供广阔市场。(2)克里木战争的失败,暴露出政府的无能和农奴制的落后。俄国武器落后,弹药不足,没有铁路运送军用物资;军队没有主动精神,很少接受战术训练,统治者认识到必须迅速发展工业,首要条件便是废除农奴制。(3)自 1830 年代起,俄国阶级矛盾迅速激化,克里木战争使充军的男性大幅增加、劳动力减少,导致土地播种面积和产量大幅减少,加上自然灾害的侵袭,农民生活水平下降,社会阶级矛盾更加尖锐,俄国国内要求废除农奴制的呼声与日俱增,革命民主力量蓬勃发展,加速了革命形势的到来。由于受苏联学者的强烈影响,以上论证多由《列宁全集》和 И. А. 札依翁契可夫斯基的《俄国农奴制度的废除》一书的观点引申而来,其缺陷显而易见。

近年来,社会舆论、财政情况、农村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等因素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注,某些传统观点也陆续得到修正。张广翔注意到社会舆论力量、经济因素和沙皇的作用,认为 1856~1858 年,象征解冻的刊物大量涌现,社会精神力量的解放走在改革之前;经济因素是推动政府改革的第二重要因素,战争造成财政危机,促使政府寻求改革;沙皇及时意识到俄国危机迫近并实行改革^①。不过曹维安对沙皇的作用评价不高,认为其最初并无确切计划,且一再拒绝自由派官僚的农民改革方案,改革后还拒不承认正在形成中的公民社会^②。中国学者特别关注改革前农村资本主义的情况,从更广阔视角考察改革前农奴制遭受的危机。苏联学者热衷于探讨俄国资本主义起源问题,往往将农奴制危机出现的时间提前,以 17~18 世纪俄国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产生和农民社会开始分化作为依据,证明俄国资本主义萌芽很早。中国学者对此并不认可。赵克毅认为,改革前贵族土地所有制才开始瓦解,从农民分化中产生出工农业资产者和无产者,农业经营中使用雇佣劳动,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破坏了农奴制生存条件。张广翔指出了苏联学者研究过程中存在的教条化趋势,并强调 19 世纪上半期农奴制才出现危机,社会劳动分工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促使农民分化,农民手工业者和亦工亦农者尤为显著,但广大农民受到较重剥削,经济状况和地位恶化,农村社会经济进步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③。周晓辉认为,18~19 世纪经商农民的大量出现,是俄国商品货币发展和农奴制经济危机的结果,加速了农民分化、农奴制瓦解和农村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④。此外,“农民革命破坏和动摇了农奴制度”这一观点广泛流行,张广翔(《俄国 1861 年改革新论》)对此做出修正,认为从俄国第一次农民战争到改革前,封建制度顶住了一次次的巨大压力延续下来,有力地证明了其谬误。张广翔还考察了德国与俄国学者有关农民改革、俄国学者有关俄国农民农奴化史的争论^⑤,有利于中国学界及时了解国外学界的最新动态。

第二,关于改革的过程。

-
- ① 张广翔:《俄国 1861 年改革新论》,《社会科学战线》1996 年第 4 期,第 232~235 页;《亚历山大二世改革与俄国现代化》,《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 年第 1 期,第 67~72 页。
- ② 曹维安:《评亚历山大二世的俄国大改革》,《兰州大学学报》2000 年第 5 期,第 117~122 页。
- ③ 赵克毅:《俄国农奴制废除前农村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河南师大学报》1982 年第 3 期,第 106~114 页;张广翔:《俄国农业资本主义关系起源的特点》,《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 年第 6 期,第 63~67 页;张广翔、丁卫平:《俄罗斯史学界关于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问题述评》,《东北亚论坛》2000 年第 4 期,第 73~76 页。
- ④ 周晓辉:《试析俄国封建晚期的经商农民》,《求索》2008 年第 12 期,第 225~228 页。
- ⑤ 张广翔:《德国学者关于俄国 1861 年改革研究述评》,《世界历史》2000 年第 4 期,第 92~106 页;《俄国学者关于俄国农民农奴化史的争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 年第 6 期,第 143~154 页。

了解改革期间诸种政治力量的配比,能更好地揭示改革的性质。然而,中国学者对此关注不多,很少触及专制制度、官僚与改革的内在联系,近年来情况才稍有好转。有的学者肯定编纂委员会和省级委员会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注意到沙皇和开明官僚对改革的推动作用。张广翔就后者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认为改革得以进行与官僚体制变化密切相关。官僚升迁取决于受教育程度而非门第出身,官僚结构和成分发生了明显变化。19世纪三四十年代,开明官僚出现并分布于政府各部门,还同自由派社会活动家以及学者建立起友好关系。以H. A. 米留金为首的开明官僚以国家为己任,在沙皇等人的支持下,通过编纂委员会制定农民改革方案,在改革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①。张广翔、李桂英还考察了改革准备阶段主要派别的政治主张和影响。前者(《俄国1861年改革新论》)认为贵族包含自由主义改革的拥护者,但自由派贵族比自由派官僚更关注自身利益;后者强调保守派、自由派和激进派在对农民让步的程度、改革的方式等问题上共识与分歧并存,但自由派倡导依靠专制制度进行渐进改革具有可行性,农民改革本质上是不同社会阶层及统治阶级内部的妥协^②。

第三,关于改革的影响。

中国学者普遍承认1861年改革是俄国由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转折点,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条件,对俄国历史发展进程起了巨大推动作用。具体表现为:农业方面,加速农民分化,促使地主经济从徭役制向资本主义经济演进,赎金为地主购买农业机器提供了有利条件,雇佣劳动和机器的使用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加速了商品农业的发展;工业方面,加速了商品流通,扩大了劳动力市场,为工业增长奠定了基础;社会方面,促进了人口流动和新社会结构的形成。

改革的消极影响尤其是“农奴制残余”问题同样引起学者关注。张兴仪、潘黎明等认为,专制制度的稳固和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保留,使农民在政治和经济上受到剥削,造成农民经济破产、农民普遍贫困化。张恩博进一步指出,临时义务农受地主限制和剥削;以工役制为基础的农业经营方式,影响了农民劳动积极性和份地产量,间接导致农业生产水平和农民购买力低下,限制了市场的扩大,最终阻碍了工业的发展^③。唐艳凤认为农民经济负担加重,改革前农民承担的劳役租、代役租和混合租在改革后均转变为代役租,与各种实物义务一起造成大量农民破产^④。

19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逐渐扩大研究视野,对改革后的农民经济、贵族资产阶级化、改革与革命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专门研究,更好地揭示了改革后俄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情况。

改革后的土地关系成为近年来关于俄国农民经济问题研究的新视角,解国良、张福顺、唐艳凤等作了有益尝试^⑤。张福顺认为,改革后农民面临许多土地问题,不能将其简单归因于缺地,份地归村社集体所有且需长期赎买、土地重分制度是农民面临的主要问题。唐艳凤观点与其相反,认为改革后农民缺地严重,实际使用土地的数量和地力远不如改革前,并将农民缺地视为改革后农民经济衰落的根源。张广翔在研究贵族资产阶级化、地主经济等问题时,阐释了改革后俄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缓慢的原因^⑥,从长时段考察改革影响。一般认为,土地重分制度、表现欠佳的地主经济和农民经济、政府对农业投入不足等因素妨碍了农业的发展。其中,制约农业投入的原因主要有:俄国长期预算赤字;军费支出居高不下,经济发展难以兼顾;自1850年代起,俄国牺牲农业发展工业,工农业发展失衡;政府

① 张广翔:《俄国1861年改革新论》,《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4期,第233~237页。

② 李桂英:《俄国1861年改革酝酿时期主要派别的政治主张及其影响》,《史学集刊》2012年第4期,第69~78页。

③ 张兴仪:《浅谈一八六一年俄国农奴制改革》,《杭州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第61~68页;潘黎明:《俄国1861年改革的历史作用》,《郑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5期,第105~111页;张恩博:《关于俄国1861年改革后的农奴制残余问题》,《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第44~47页。

④ 唐艳凤:《俄国1861年改革后农民赋役负担探析》,《史学集刊》2011年第3期,第122~127页。

⑤ 解国良:《从土地关系的演变重新解读俄国农民问题》,《俄罗斯研究》2005年第2期,第68~75页;张福顺:《资本主义时期俄国农民土地问题症结何在》,《黑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第37~40页;唐艳凤:《1861年改革后俄国农民土地使用状况探析》,《北方论丛》2011年第1期,第78~81页。

⑥ 张广翔:《19世纪下半期俄国贵族经济地位的变化》,《史学月刊》1990年第3期,第102~108页;《19世纪八九十年代俄国地主经济的基本特征》,《东北亚论坛》2001年第4期,第87~92页;《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地主经济》,《史学集刊》1990年第4期,第67~72页。

各部门围绕如何吸引农业投资和增加农业贷款问题冲突不断;等等^①。

中国学者还考察了改革后主要社会阶层的发展情况。例如,张广翔较为细致地考察了改革后俄国工人的劳动道德以及工人和乡村教师的生活水平,证明改革并不彻底。“大改革”前后各个等级逐渐失去特权,在法律地位上彼此接近。张广翔、张德敬等格外关注贵族资产阶级化和资产阶级贵族化趋势^②。曹维安考察了改革与1905年革命、1917年革命之间的关系,认为改革虽为独立社会意见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但却不允许其影响国家政策,结果国家与自由知识分子互不信任;政府对全民族尤其是农民的需要持有混乱看法,最终为20世纪初的革命创造了条件^③。

2. 司法改革与地方自治改革。

第一,司法改革。

1864年的司法改革,为俄国创建了以欧洲模式为基础的现代司法体制,但遗憾的是,中国学者对此很少注意。近年来,郭响宏对这一改革进程展开专项研究,分别考察了俄国近代陪审制度的创立及实践、俄国近代律师制度的创建及影响,总结了司法改革同帝俄晚期法治国家建设的关系。他认为,囿于专制制度框架,俄国未能建立真正的法治国家,但改革实现了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相对分离,在法律上确立了司法独立原则,建立了法官终身任职、审判公开、辩诉体制、陪审制、律师制等一系列新制度,保护了个人权利,推动了法制的完善^④。

第二,地方自治改革。

1861年改革从法律上取消了地主对农民的统治权,为地方自治局的出现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国学者普遍将地方自治局的出现归于两个因素。一是满足国家政权需求,政权统治农村人口的社会基础被动摇,改革前贵族地主在经济上的角色必须由新的“中间人”替代。二是为了补偿地主在改革中的损失。此外,罗爱林注意到了农民暴动和自由派在推动地方自治机构产生过程中的影响^⑤,李欣(《俄国近代化的困窘——亚历山大二世诸改革述评》)探讨了沙皇的积极倡导作用。

中国学者对地方自治局的性质和作用存有争议。胡黎霞认为,地方自治局活动虽兼具一定独立性,但受沙皇和政府控制。罗爱林则认为,地方自治机关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代议制机关,但因只设立在省、县两级,因而只具有地方性质。学者们对地方自治局作用的说法,逐渐由消极评价为主转向积极评价为主、消极评价为辅。1990年代以前,胡黎霞等虽注意到自由派贵族企图通过代议机关限制专制政权的强烈意愿,却同时认为贵族在地方自治局中居于主导地位,自治局的经济和福利计划优先考虑贵族利益,并将贵族的税收负担转嫁给农民。不过地方自治局所蕴含的积极因素陆续被挖掘。张广翔、罗爱林认为,地方自治机关是自由主义活动的基础,为立宪派的形成奠定了人才基础。张广翔、李青肯定了地方自治局在促进俄国新型医疗体制的建立、推动国民教育事业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⑥。王绍章考察了改革后地方自治局中的“第三种人”,肯定其在履行地方自治局的经济职能、促

① 张广翔:《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北方论丛》2005年第3期,第101~106页;张广翔、齐山德:《18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农业现代化的阶段及其特征》,《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年第6期,第105~112页;张广翔、王学礼:《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农业发展道路之争》,《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年第6期,第28~35页。

② 张广翔:《19世纪下半期俄国贵族的资产阶级化》,《史学月刊》1987年第5期,第91~93页;张德敬:《论农奴制改革后俄国专制制度的演变》,《南昌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第58~63页。

③ 李欣:《俄国近代化的困窘——亚历山大二世诸改革述评》,《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4期,第91~97页;张广翔:《俄国历史上的改革与反改革》,《史学集刊》1991年第4期,第69~74页。

④ 郭响宏:《近代俄国陪审制度的创立及其实践》,《世界历史》2012年第4期,第34~46页;《近代俄国律师制度的创建及其影响》,《世界历史》2014年第1期,第111~125页;《俄国1864年司法改革与帝俄晚期法治国家建设》,《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第162~169页。

⑤ 罗爱林:《俄国自由派与地方自治机关》,《史学集刊》1998年第4期,第56~62页。

⑥ 胡黎霞:《俄国地方自治局的产生及其历史演变》,《东北师大学报》1990年第3期,第63~68页;胡黎霞:《俄国地方自治局的阶级构成及相互关系》,《吉林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第80~84页;张广翔:《19世纪下半期~20世纪初俄国的立宪主义》,《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6期,第83~92页;张广翔、李青:《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国地方自治局的兴医举措》,《西伯利亚研究》2012年第2期,第65~73页;张广翔、李青:《19世纪至20世纪初俄国地方自治局兴学之举》,《俄罗斯学刊》2012年第2期,第73~83页。

进地方经济发展方面所发挥的作用^①。

国外学者通常将 1890 年条例视为地方自治局发展的分界点,胡黎霞(《俄国地方自治局的产生及其历史演变》)否定了这种分期方法,认为以“社会论”取代“国家论”作为标准并不可取,因为 1890 年条例是俄国国内外复杂形势的结果,对地方自治局性质和生活方式的规定没有变化,有鉴于此,对地方自治局的发展过程,她提倡 1864~1904、1904~1905 和 1905~1914 年“三段说”。

3. “反改革”。

改革很快便受到抵制。自 1866 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遭遇暗杀事件开始,有关地方自治、司法制度、书刊检查、大学章程等改革的法律条文相继被修正。1881 年亚历山大二世去世后,刚刚执行的温和立宪措施立刻被废止,19 世纪八九十年代反改革时期终于到来。1980 年代前,中国学者往往采用“改革自上而下进行,局限性不可避免”说辞,解释反改革的出现和改革不彻底的原因。1980 年代末以来,李欣、张广翔、曹维安、郭响宏等特别关注这一现象,不仅较为系统地梳理了 1866~1881 年间各个领域反改革的历史,还深入分析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李欣(《俄国近代化的困窘——亚历山大诸改革述评》)认为,专制制度和保守贵族是改革的两大阻碍,改革催生出一批与专制政府对立、要求立宪的知识分子,他们与旨在专制制度框架内改革的政府相冲突,改革只能倒退。张广翔(《俄国历史上的改革与反改革》《俄国 1861 年改革新论》)将官僚纳入讨论范围,认为改革出于维护专制制度目的,交由自由派官僚设计方案却移交其政敌实施,面对强大的专制制度,自由派官僚容易受到攻击,改革保证机制过于脆弱,无法保证改革沿正常轨道运行;同时,张广翔还肯定暗杀事件的积极作用,指出沙皇对暗杀的恐惧影响到国务活动,第三厅的作用逐渐加强,沙皇在改革的过程中逐渐丧失主动性,保守派成功压制自由派官僚,反改革进程开始。

中国学者对“大改革”的研究已逾半个世纪,在上述领域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实事求是地讲,研究情况并不乐观。有关农民改革的研究过于宽泛,尽管近年来中国学者较为积极地吸收国外学界的成果,但有关改革的背景尤其是农奴制是否遭遇危机、改革过程中不同政治派别的主张及对其应持有的评价、改革对俄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具体影响等问题的研究仍十分薄弱,有关农民改革的区域性研究几乎毫无进展;在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众多改革中,只有司法改革、地方自治改革、财政改革(往往和 19 世纪下半期工业化研究联系在一起)被专门研究,军事、教育、书刊等改革几乎无人问津。只有厘清上述问题,才能更好地解释 1860 年代至 1890 年代俄国出现的一系列“反改革”现象,加深对俄国专制政权和帝俄末期历史进程的理解。

四 工业化研究

现代化是指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工业化是其核心内容。中国学者对俄国工业化研究的成果十分丰富,主要集中于工业革命、工业化特点尤其是工业化的资金来源等问题。

1. 工业革命。

第一,关于起止时间。

工业革命被普遍视为工业化的起点,中国学界对俄国工业革命起止时间大体有四种观点。第一种是詹方瑶、陶惠芬等提出的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至 90 年代说,将工场手工业发展、社会分工扩大、雇佣劳动关系出现、资本原始积累和西方先进技术的引进视为工业革命开始标志,以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形成作为完成标志。第二种是宋华提出的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至 80 年代末期说。第三种是张恩博提出的 1861 年开始说,并认为革命前俄国尚未完成工业革命。该种观点将机器使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引起社会阶级关系重大变革视为开始标志,将生产工作母机的机床制造业的建立视为完成标志。第四种是张广翔提出的 1850 年代中期至 1890 年代说,以棉纺织业大规模采用机器生产、由手工工场

^① 王绍章:《19 世纪下半期俄国经济发展中的“第三种人”》,《内蒙古大学学报》2001 年第 3 期,第 54~58 页。

向机器生产过渡作为开始标志,以大机器工业开始主宰俄国国民经济作为完成标志^①。

第二,关于起因与影响。

张广翔系统地考察了俄国工业革命的起因,认为俄国工业革命的发端源自成熟的国际和国内条件。国际方面,自1850年代开始,俄国经济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接触更加频繁,西欧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向俄国输送资本、机器和技术,推动棉纺织业机械化进程。国内方面,克里木战败使俄国民众变革意识高涨,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劳动分工的深化和国内市场的发展,推动生产方式的变革;工商业城市和乡镇工业活动领域拓宽,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和技术进步的载体;资本主义手工工场为工厂生产奠定了物质和技术基础;商业利润和对边区人民的掠夺构成主要资本。赵士国等则特别关注商品经济与工业革命兴起的关系,认为19世纪上半期俄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影响工业革命的重要因素,肯定了国内外贸易发展、商品货币关系和商业竞争的积极作用^②。

中国学者认为,俄国工业革命的影响主要有三:一是重工业技术进步、迅猛发展,以冶金业、煤炭业和石油业变化最为显著;二是工业生产结构发生根本变化,同重工业部门相比,纺织业和食品业发展速度放缓;三是社会阶级力量配置发生变化,工人阶级成为俄国社会生活的主导力量^③。

2. 工业化的特点。

第一,受国家干预。

孙成木、张恩博、陶惠芬、宋华、张广翔、杨翠红、梁红刚、罗爱林等探讨了政府发展经济的举措,普遍认为政府积极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保护关税、改革币制、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扩大铁路建设和国家订货,鼓励了资本主义经济,促进了重工业和新兴工业的发展,改变了工业布局 and 工业结构;促进了技术不断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工业品自给力的提高,改善了进出口贸易结构;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缩短了俄国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迎来了1890年代的工业高涨^④。

其中,工业化的资金来源问题备受关注。俄国工业化需要大量资金,这些资金通常来源于国外和国内。19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对俄国引进外资的缘起、外资的投资方向及其作用等问题争论不止。宋华、邵彦秀、陶惠芬、刘爽等将引进外资归因于俄国国内原始积累不足,政府将外资作为工业发展的启动资金。张广翔持相反的观点,指出俄国国内原始积累并非不足,而是庞大的军费支出给国家经济带来极大压力,俄国将绝大部分国内积累用于非生产领域,引进外资后政府依旧如此^⑤。至于外资对俄投资的方向,宋华(《试论俄国近代工业发展相对落后的原因》)认为面向重工业领域尤其是采矿部门;陶惠芬(《俄国工业革命中的对外经济关系》)认为是办企业、开银行和发贷款;张广翔则认为以生产性投资为主,重点是铁路和股份制企业以及向俄国政府对内对外政策拨款,不同时期有不同形式^⑥。

中国学者起初普遍认为俄国引进外资的负面影响较大。宋华等强调外资集团在俄国重工业部门占据优势,利用资本优势控制俄国工业发展方向,利用廉价劳动力并掠夺自然资源,利用经济依赖取

① 詹方瑶:《试论俄国产业革命的道路》,《郑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第96~105页;陶惠芬:《俄国工业革命中的对外经济关系》,《世界历史》1994年第3期,第50~59页;宋华:《试论俄国近代工业发展相对落后的原因》,《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第46~52页;张恩博:《俄国工业革命刍议》,《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2期,第24~32页;张广翔:《论19世纪俄国工业蒸汽动力发展历程及其工业革命特点》,《求是学刊》1990年第4期,第87~92页。

② 张广翔:《19世纪俄国工业革命的前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3期,第66~72页;张广翔:《19世纪俄国工业革命的发端》,《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2期,第21~27页;张广翔:《19世纪俄国工业革命的特点》,《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年第2期,第9~15页;赵士国、曹英:《商品经济与俄国工业革命的兴起》,《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6期,第87~92页。

③ 张广翔:《19世纪俄国工业革命的影响》,《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3年第4期,第66~71页。

④ 孙成木:《试探19世纪中叶后俄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原因》,《世界历史》1987年第1期,第35~44页。

⑤ 宋华:《19世纪90年代俄国发展工业的措施述评》,《河南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第72~76页;邵彦秀:《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缓慢的原因》,《世界历史》1993年第1期,第71~78页;刘爽:《19世纪末俄国的工业高涨与外国资本》,《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4期,第218~224页。

⑥ 张广翔:《外国资本与俄国工业化》,《历史研究》1995年第6期,第144~158页。

得俄国对其国家的政治依赖。张广翔却认为俄国引进外资利大于弊^①,充分肯定外资在促进俄国工业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然而,这一观点很快便遭受质疑,学者多以“俄国政府过分依赖外资,影响了本国资本的积累和民族工业的发展”为由,强调外资给俄国带来的负面影响。张广翔通过考察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俄国对外资的依赖程度和外资的作用予以回应。他指出,评价外资不能简单以道德为标准,而应从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这一前提出发,肯定了外资的积极作用^②。刘爽《19 世纪末俄国的工业高涨与外国资本》通过考察 19 世纪俄国在世界经济交往中的位置与作用,剖析外资在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运作机制及其产生的复杂影响,认为俄国经济与文化的落后要求俄国抓住引进外资的历史机遇。郭宇春考察了犹太人在俄国经济生活中的影响和作用,认为自 19 世纪下半期起,犹太人将资本主要投向工业和金融业,促进了俄国经济现代化^③。

工业化同样离不开俄国国家财政的支持。国家多次实行保护关税政策,将工业置于高关税羽翼之下。近年来,张福顺、张广翔、梁红刚梳理了 19 世纪俄国保护关税政策的历程,将其分为禁止性、温和性和强制性保护关税三个时期;再现俄国关税政策调整过程中自由贸易派和保护关税派之间、企业主之间展开的长期争论,肯定关税政策在调节商品尤其是进口机械设备方面,对俄国纺织、机器制造、冶金、煤炭等工业部门的推动作用^④。罗爱林、张广翔、裴然、李旭、梁红刚还考察了 19 世纪下半期俄国税制改革的大致情况,及其对工商业企业产生的深远影响。其中,罗爱林介绍了维特改革始末及其局限,张广翔、梁红刚考察了俄国财政部与国有资产部、财政部与内务部和东正教事务最高会议、财政部与交通部围绕工商业管理权的争论^⑤;张广翔不仅修正了“俄国以降低农民生活水平为代价,短时间完成工业化”的陈旧观点,而且较为详尽地阐述了 1894~1914 年俄国第四次酒销售垄断的初衷与其结果相悖的问题^⑥。上述成果无疑有助于中国学者更好地理解俄国工业化进程、政府机关的活动和专制制度的性质。

第二,发展不平衡。

张恩博、张广翔均认为,工业革命主要在少数省区发生,地区发展极不平衡,但两人又在对部门的发展情况的看法上存有分歧。前者《俄国工业革命刍议》认为,铁路、采矿、冶金等重工业部门发展迅速,在工业革命开始后不久,重工业发展速度就超过轻工业。后者则主张分阶段探讨,强调在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铁路运输业产生革命性影响,但俄国冶金业和机器制造业的发展不如人意,重工业生产未在国民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直到 1880 年代末,重工业发展速度才超过轻工业,冶金业成为大机器工业的基础。

近年来,中国学者十分关注能源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在俄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优异表现。张广翔初步探讨了国家关税政策对俄国煤炭贸易和燃料工业的影响、石油工业发展及其对俄国历史进程的影响^⑦;张广翔、杨翠红、白胜洁还深入分析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俄国石油、煤炭工业垄断的形成及其影响等问题^⑧,尤其强调垄断对俄国工业发展产生促进和抑制的双重作用。张广翔、范璐祎考察了 18

① 张广翔:《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俄国引进外资及其作用问题》,《外国问题研究》1988 年第 3 期,第 14~27 页。

② 更多争论参见周嘉澍:《张广翔教授与中国的俄国史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14 年第 12 期,第 243~244 页。

③ 郭宇春:《十月革命前俄国经济生活中的犹太人》,《黑龙江社会科学》2008 年第 6 期,第 21~23 页。

④ 张福顺:《19 世纪俄国保护关税政策述论》,《东北亚论坛》2001 年第 3 期,第 76~80 页;张广翔、梁红刚:《19 世纪俄国保护关税政策问题》,《史学集刊》2015 年第 3 期,第 45~56 页。

⑤ 罗爱林:《维特货币改革评述》,《西伯利亚研究》1999 年第 5 期,第 9~16 页;张广翔、梁红刚:《19 世纪下半期俄国工商业税改刍议》,《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5 年第 1 期,第 63~71 页。

⑥ 张广翔:《19 世纪~20 世纪初俄国税制与经济增长》,《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 年第 3 期,第 108~115 页;《1894~1914 年俄国酒销售垄断的初衷及效果》,《世界历史》2012 年第 1 期,第 43~53 页。

⑦ 张广翔:《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欧洲煤炭市场整合与俄国煤炭进口》,《北方论丛》2004 年第 1 期,第 66~69 页;《19 世纪 60~90 年代俄国石油工业发展及其影响》,《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 年第 6 期,第 119~126 页。

⑧ 张广翔、白胜洁:《论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俄国的石油工业垄断》,《求是学刊》2014 年第 3 期,第 1~11 页;张广翔、白胜洁:《论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俄国的工业垄断》,《江汉论坛》2015 年第 5 期,第 109~114 页;杨翠红:《俄国早期工业化进程解析》,《贵州社会科学》2013 年第 9 期,第 116~119 页。

~19 世纪工业革命开始前俄国水运的特点和局限^①;白述礼、张广翔肯定铁路在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并分析了铁路网建设的原因和特点^②,后者(《19 世纪 60~90 年代俄国石油工业发展及其影响》)还深入分析铁路在推动重工业部门技术进步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工业化发展速度和水平同样备受争议。张恩博(《俄国工业革命刍议》)、宋华(《试论俄国近代工业发展相对落后的原因》)认为,工业革命因受农奴制残余影响,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发展速度十分缓慢。张广翔(《19 世纪 60~90 年代俄国石油工业发展及其影响》)意见相反,认为俄国工业生产能力虽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但在工业发展速度和生产集中方面均超过西方,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石油工业已经能够左右国际市场和世界经济局势。杨翠红(《俄国早期工业化进程解析》)、张广翔、梁红刚虽同样肯定了俄国工业化所取得的成就,但分别认为限制人们追求财富的东正教伦理和 19 世纪下半期俄国工商业管理权的争论,制约了俄国早期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③。此外,赵士国、刘自强、张广翔、王子晖还从俄中两国早期工业化的先决条件和启动模式入手,比较两国工业化道路的异同,初步探讨了最终造成两国工业化水平差异的原因^④。

自 1980 年代起,中国学者才着手研究俄国工业化进程。虽仅经历三十余年,但迄今为止已就俄国赶超型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大力干预、重工业优先发展、大工业高度集中、工农业矛盾尖锐等特点达成共识,并陆续对重工业部门展开深入研究。然而,革命前能源工业、工业垄断、交通运输业发展情况仍需重点关注,尤其针对俄国煤炭与石油业竞争尖锐的原因、垄断对重工业和轻工业典型部门的影响、铁路对各行业和各地区发展的影响、俄国铁路建设和管理的成败得失等问题,需要加强研究,以更准确地阐释俄国工业化进程,揭示其在世界工业发展史中的地位。

五 社会史研究

自 1990 年代末,俄国社会史逐渐成为中国俄国史研究的新方向。俄国社会史研究以跨学科的社会学方法,代替以往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描述历史事件的陈旧方法,强调社会问题和社会进程,重点关注俄国历史上的家庭、移民、人口、城乡、社会组织与结构等问题。迄今为止,中国学者主要在俄国村社制度、城市化以及等级—阶级结构研究方面取得一定进展。

1. 村社制度研究。

第一,关于村社的概念与起源。

在中国学界,“农村公社”“公社”和“村社”三种提法曾长期并存。张广翔认为,这同俄国国内对村社的称呼不一有关。村社被农民称为“米尔”,被受过教育的人称为“公社”或“农村公社”,被政府称为“土地公社”。自 1838 年起,作为“土地联盟”的公社正式被称为“土地公社”,而作为行政警察单位的公社被称为“农村公社”^⑤。目前,中国学者往往称作农村公社或村社,尤以后者为主。

马英昌、陈宝江在村社起源问题上分歧较大。前者认为,古罗斯时期存在几种类型公社,“维尔夫”是南方基辅一带的叫法,在北方诺夫哥罗德被叫作“米尔”,13 世纪罗斯政治中心向东北转移,“米尔”成为东北罗斯公社普遍采用的术语和地域公社的概念,“维尔夫”从俄语中消失。后者认为,7~9 世纪存在“维尔夫”和“米尔”之别;9 世纪之后,随着东斯拉夫人早期国家的形成,两者均被“公社”所取代^⑥。

第二,村社的职能与性质。

① 张广翔、范璐祎:《19 世纪上半期欧俄河运、商品流通和经济发展》,《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2 年第 2 期,第 54~66 页。

② 白述礼:《试论近代俄国铁路网的发展》,《世界历史》1993 年第 1 期,第 62~71 页。

③ 张广翔、梁红刚:《19 世纪下半期俄国工商业管理权之争及其影响》,《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5 年第 2 期,第 111~116 页。

④ 赵士国、刘自强:《中俄两国早期工业化道路比较》,《史学月刊》2005 年第 8 期,第 111~117 页;张广翔、王子晖:《俄中两国早期工业化比较:先决条件与启动模式》,《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 年第 6 期,第 37~44 页。

⑤ 张广翔:《19 世纪俄国村社制度下的农民生活世界——兼论近三十年来俄国村社研究的转向》,《历史研究》2004 年第 2 期,第 160 页。

⑥ 马英昌:《基辅罗斯时期的公社》,《西北师大学报》1983 年 4 期,第 134~141 页;陈宝江:《俄国农村公社探究》,《世界历史》1985 年第 2 期,第 45~48 页。

中国学者普遍认为村社具有经济、司法、行政、警察、慈善、宗教、文化等多重职能,为广大农民以及政府和封建主服务。村社既是整个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又是农民自治、实施自我保护的有效手段。学者们还注意到村社经济结构的二重性。李玉奎、曹维安认为,村社农民个体生产、私人占有多数产品,村社又对全部耕地统一规定使用制度、对全部土地具有所有权,表现出村社私有制和公有制的混合倾向^①。

学者们十分关注村社内部机制。张广翔、罗爱林注意到村社内部平均主义原则。前者运用社会学方法,分析保持村社凝聚力的土地重分、连环保、服兵役、慈善、救济机制,并指出农民外出打工具有冲击和强化村社制度的双重功效。后者则专门考察村社在农民兵役义务中的作用,尤其是通过平均主义传统保护农民的责任^②。

因对村社内部机制和原则理解不同,学者们对村社同农奴制、1861年农民改革关系问题的认识存有较大分歧。曹维安认为,村社起初延缓了农奴制的形成,但在被封建主义改造后成为维护和加强农奴制的工具^③。张广翔(《19世纪俄国村社制度下的农民生活世界》)却认为将村社与农奴制简单等同起来欠妥,这一做法与农奴制形成前和废除后村社均存在的事实相悖;村社与地主和国家的利益表现出较多非一致性;村社具有二重性职能、自治与民主精神。这些都表明村社并非维护和加强农奴制的有力工具。此外,两者均认为改革后村社大会成员发生变化,米尔大会成员年轻化、村社内部民主的基础扩大,分歧主要在于改革后村社生活原则是否发生变化。前者认为,改革使农民阶级分化加速,传统习惯改变,造成农民份地严重不足和贫困化。后者则认为,改革后村社不仅未背离改革前的生活原则,还更加严格、灵活地实行这一原则,大多数农民仍继续在传统的村社制度下生活^④。

第三,斯托雷平村社改革。

斯托雷平改革涉及破坏村社、建立独立田庄和农场、移民三项内容。斯托雷平本人及其改革向来受俄国学者热议,苏联解体后还掀起新一轮研究热潮。中国学者对斯托雷平改革的关注始于1980年代,尤其关注村社改革的原因及其影响。

中国学者普遍认为改革是政府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但在为何维护统治这一问题上存在分歧,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主张政府因农民反抗而改革。比如曹维安(《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与农村公社》)认为,1861年改革加强了农民认为全部土地应归村社的传统观念,农民反抗地主和政府的倾向强烈,迫使政府破坏村社,扶持富农,保持政权稳定。另一种观点认为,地主经济发展水平低,政府力图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南宫、张广翔均持这种观点,认为村社和份地制的存在,影响了土地的集中和雇佣劳动的出现,阻碍了农业资本主义发展,1905年后政府为了巩固地主阶级统治,保证地主在国家农业制度中的优势地位,分化村社相对统一的共同利益,再造专制制度的社会基础^⑤。

中国学者对改革的影响持两种态度。南宫(《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等评价积极,认为改革破坏了遗留的村社和份地制度,加速了农民分化,富农和无产阶级化的贫农退出村社,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提高了农作物收获量,增加了谷物出口额。但这种观点遭受到质疑。张广翔(《斯托雷平农业改革的几个问题》)等认为农民土地利用结构未发生大的变化,粮食输出量确实很大,但主要是为了换取外汇,国内实际粮食收获量并不大。吴来山、杜立克、吴贺等还进一步强调改革对俄国现代化进程产生的积极影响。张广翔(《俄国农业改革的艰难推进与斯托雷平的农业现代化尝试》)评价消极,认为

① 李玉奎:《18~19世纪俄国公社的结构及其演变》,《史学月刊》1988年第5期,第86~94页;曹维安:《关于俄国农村公社的几个问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第97~98页。
② 张广翔:《俄国村社制度述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4期,第62~68页;罗爱林:《论俄国农村公社与农民的兵役义务》,《史学月刊》2007年第11期,第69~75页。
③ 曹维安:《俄国的农奴制度与农村公社》,《兰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第125~127页。
④ 曹维安:《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与农村公社》,《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第136~137页;张广翔:《俄国村社制度述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4期,第64页;张广翔:《俄国农业改革的艰难推进与斯托雷平的农业现代化尝试》,《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5期,第65~73页。
⑤ 南宫:《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史学月刊》1983年第4期,第63~64页;张广翔:《斯托雷平农业改革的几个问题》,《史学集刊》1992年第4期,第46~48页。

农业改革收效甚微,农民大都不愿退出村社,未彻底缓解农民土地不足问题,未缓和农村的社会紧张状态。张广翔、解国良等还各有侧重地探讨改革失败的原因。前者将失败归因于上层统治者的主观倾向性、放弃旧制度和实施改革的准备不充分以及社会对实施改革的思想准备不足。后者认为,改革未能满足广大农民的利益,且与农民的传统观念背道而驰,农民的抵制导致了改革的失败^①。

此外,部彦秀分析了斯托雷平被刺杀的原因。吴贺介绍了21世纪俄国学者有关斯托雷平个人立场、改革的作用、改革失败原因、改革思想遗产的研究情况,认为俄国学者研究日趋成熟、评价较为积极,并将研究拓展到法律、个人自由、现代化等领域^②。

第四,村社长盛不衰的原因。

村社自基辅罗斯起一直存在到1920年代,直至革命前半数以上农户仍留在村社。中国学者十分关注俄国村社长盛不衰的原因,普遍认为村社职能二重性和平均主义机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曹维安(《关于俄国农村公社的几个问题》)将政治因素放于首位,认为村社经受国家不断改造,成为对统治阶级有利的基层行政纳税组织,得到国家政权的积极保护。张广翔认为,俄国的村社长盛不衰,与村社自身性质和运行机制以及村社的外部条件密切相关。学者们的阐述日趋详尽,仅就其大者略举几端:自然—气候因素从根本上影响村社的兴起与延续;土地重分制度保证了农民最低限度的生存需要;平均机制保证农民的生活资料,限制农民的分化;帮助和互助传统化解单个农民面临的难题;村社职能和社会结构的二重性,使其善于灵活地应对社会和经济变化;民主原则和集体主义精神对农民的感召力强;农民文化水平低且个性不强,社会舆论力量使农民时时遵守传统道德与行为规范;从外部条件看,村社得到专制制度的长期保护、国家经济和法律上的支持,且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工业革命严重滞后,等级隔绝、社会流动水平低;等等^③。

罗爱林注意到平均主义机制的消极作用,认为它打击了农民进取精神和追求财富的愿望,使农民易于产生惰性,导致俄国农业长期落后^④。张广翔(《19世纪俄国村社制度下的农民生活世界——兼论近三十年来俄国村社研究的转向》)介绍了一个半世纪以来的“村社之争”以及1970年代以来俄国史学家所取得的成果。

2. 城市化研究。

城市化是涉及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变迁的复杂过程。历史学往往将城市化置于历史发展进程中,并应用经济学、社会学和人口学等其他学科的概念和方法加以研究。

城市化研究是俄国社会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学者对俄国城市化的研究始于20世纪末,迄今为止已就俄国城市化发展速度缓慢达成共识,并分析其直接和间接成因,还将俄国农民和农业现代化问题纳入城市化视野加以考察。

城市化水平常用城市人口的比重衡量,城市化的实质是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因此理解俄国城市化进程的关键在于把握影响城市人口增长的因素。张广翔认为,城市人口的增长方式以城市人口自然增长和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为主,以城乡行政区划的变更为辅。1740年代至1860年代,俄国城市人口在国家总人口中的比重下降,城市化进程缓慢。这一方面由于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低于农村,另一方面在于农民移居城市数量不足,跨等级间流动较少,部分市民还因竞争力不足而迁往农村或转为农民。

张广翔是国内研究俄国城市化进程的主要学者,较为深入地研究了农民向城市迁移不足的原因。

① 解国良:《俄国农民抵制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基本原因》,《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第99~101页。

② 部彦秀:《斯托雷平改革与斯托雷平之死》1996年第4期,第110~115页;吴贺:《21世纪俄罗斯学界关于斯托雷平研究的概述》,《世界历史》2010年第3期,第131~140页。

③ 张广翔:《自然气候因素对俄国历史进程的影响》,《求是学刊》1994年第6期,第102~107页;《俄国村社制度述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4期,第67~68页;《19世纪俄国村社制度下的农民生活世界——兼论近三十年来俄国村社研究的转向》,《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第162~173页。

④ 罗爱林:《俄国农村公社与平均主义传统——“俄国村社与传统”系列研究之一》,《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第139~143页。

近年来,周晓辉也作了有益尝试,分析制约欧俄地区农民外出打工的因素。两者观点可归纳如下:(1)价格革命的制约。谷物价格远远高于畜产品价格,农产品涨幅远远超过工业品涨幅,物价涨幅高于工资涨幅,农民尽可能保持与农业的联系,坚持经营菜园、饲养牲畜和种地。(2)村社的阻挠。村社通过土地重分制度和平均主义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民的分化,稳定的农村社会结构难以将农民推向城市;身份证制度严格限制了农民的迁移,连环保制有力地约束了农民的出行。(3)城市工业发展落后。城市发展工业本可为农民跨出农业领域创造机会,但19世纪俄国城市以行政职能为主,决定了其基础设施、社会文化环境的发展程度均不利于工业。受自然气候的影响,农民因农作物生长期短而几乎将全部精力用于粮食生产,无暇顾及种菜,蔬菜无法自给和供应城市,结果非黑土区和奥卡河流域城市蔬菜生产发达,多余蔬菜销往农村,城市劳动力离开了工业生产。纺织业虽是工业革命的先导,却因手工织布比机器生产更有利可图,作为生产关键环节的织布工艺长期滞留在手工工场阶段;机器制造业发展缓慢,不利于工业城市的孕育;18世纪俄国工业中最重要的冶金业,因长距离运输矿石成本过高而尽量在矿区附近设厂;19世纪最为发达的纺织业,由于城市对其态度冷淡而赴农村设厂。俄国工业在很大程度上绕开了城市。(4)农民外出打工的局限。农民虽外出打工,但多从事季节性劳动,并未失去农民地位,仅将进入城市视为权宜之计,即使转入城市仍眷恋农村,同农村保持着业务和血缘上的密切联系;人数居高不下的就地打工者延缓了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进程,农村居民点在经济方面超过城市,但19世纪下半期俄国享有城市地位的工业村很少,工厂工人却不是城市市民。(5)其他因素。政府以种种优惠条件诱使农民迁往新征服的土地,补充城市人口的渠道因此断流;政府的相关工商业政策不完善、交通不便和运费昂贵^①。张广翔在俄国城市化研究方面还有两大较突出的贡献,一是修正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二是重新审视了18~19世纪俄国城市的职能意义^②。

社会结构的变化是俄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具体体现。除了农民、工人、贵族、资产阶级外,官僚、僧侣、军人、教师、城市等级等阶层也纷纷被纳入城市化研究视野。近年来,中国学者同样十分关注俄国的社会史研究最新动向,刘爽、张广翔等考察了俄国社会史研究的传统及其在当代的发展、米罗诺夫与俄国社会史研究等问题,有利于国内学者掌握俄国学者研究的最新动向^③。

中国学者对俄国社会史的研究仅有二十余年。尽管研究成绩较为斐然,但仍需加大俄国史研究力度,厘清19世纪至20世纪初俄国等级—阶级和过渡状态的阶层演进的脉络,弄清各等级自身的社会心理特点及其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关注家庭、福利、教育、法制、民族、慈善、移民、社会心理、日常生活等处于研究边缘的问题,从社会史、文化史、历史人类学等多重角度解读俄国历史进程。

六 俄国三次革命研究

俄国三次革命引起中国学界和政界的高度关注,俄国革命史研究也因此而经久不衰。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的俄国革命史研究采用新方法,得出新结论,极大拓宽了俄国史研究的视野。

1. 1905~1907年革命。

1950年代中期,伴随着第一次俄国革命50周年的契机,中国学界涌现出一系列成果,介绍革命对中国革命进程的影响和革命中的农民运动,以及革命的前提、性质、特点等,然而其中“以论带史”现象异常严重。196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对1905~1907年俄国革命的关注度降低,直到1980年代初才又升温并取得新的进展。

① 张广翔围绕俄国城市化问题共发表1部专著和15篇论文,可参见张广翔:《俄国封建晚期城市化缓慢的直接原因》,《世界历史》2002年第6期,第69~82页;《俄国封建晚期城市化缓慢的间接原因》,《世界历史》2003年第6期,第85~94页;等等。另参见周晓辉:《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俄国欧洲地区打工农民问题研究》,《历史教学(高校版)》2008年第12期,第66~70页。

② 参见周嘉澍:《张广翔教授与中国的俄国史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12期,第245~246页。

③ 刘爽:《俄国社会史研究的传统及其在当代的发展》,《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1期,第75~83页;张广翔:《米罗诺夫的〈社会史〉及其引起的争论》,《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4期,第123~130页;刘爽:《当代俄罗斯社会史研究的特点及趋向》,《北方论丛》2004年第6期,第69~74页;刘爽:《米罗诺夫与当代俄罗斯社会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1期,第71~78页。

第一,关于革命的原因。

传统观点认为,1905年革命具有必然性,是俄国社会阶级矛盾尖锐的产物,可大致归纳如下:无产阶级受本国资本家和外国资本的剥削压迫,农民受农奴制残余的束缚,国内被压迫民族强烈反对俄罗斯主义民族政策,三者均有强烈的革命要求,要求推翻沙皇制度;面对高涨的革命浪潮,政府除采取镇压手段外,还借助对外战争转移人民视线,日俄战争加重了政府对人民的剥削,俄军的失败暴露出沙皇制度的腐朽,成为革命的导火索。

近年来,中国学者在研究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原因时,有四个新动向。一是主张从长时段关注历史进程,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前,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革命激进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揭开了20世纪初俄国革命的序幕,进而分析革命激进主义和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姚海认为,革命激进主义与西方和俄国传统文化因素,以及俄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成长有关。赵士国认为,恐怖主义源于民粹派三种错误理论。曹维安、周厚琴则强调以暴易暴的俄国传统^①。二是关注革命前自由主义运动。中国学者普遍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大量加入是世纪之交俄国自由主义运动新的变化。姚海、王绍章等对地方自治机关中的“第三种人”赞赏有加,认为其为自由主义力量新来源,在争取群众、宣扬主张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姚海、张广翔肯定自由主义政治团体尤其是“解放同盟”的作用^②。三是关注不同政党在革命过程中的发展及作用。传统观点往往对资产阶级持否定态度,并认为资产阶级尤其是立宪民主党具有反革命、反人民、反民主性质,张建华却认为在革命期间资产阶级由左转向右,先倾向革命民主派,后与政府合作^③。张广翔(《19世纪下半期~20世纪初俄国的立宪主义》)还指出立宪民主党的基本矛盾在于多数派、少数派和自由主义民粹派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叶艳华考察了革命期间社会革命党的情况,认为其在组织上由少量进行秘密活动的知识分子小组发展成由工人和农民参加的活跃政治组织,在全俄十月政治罢工和十二月武装起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农业改革方案还得到群众和杜马代表的支持^④。四是摆脱传统模式,讨论革命可否避免。张广翔在这方面进行初步探索,认为19、20世纪之交俄国社会处于紧张状态,但政府仍可避免革命,只是专制制度一再坐失良机,错过了由绝对君主制转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轨道、动员所有力量使国家进入民主轨道、通过社会主义制度寻求幸福的种种机遇^⑤。

第二,关于政治制度演变。

中国学者特别关注1905年以后俄国政治制度的演变情况,主要有三种观点。以王清和、祝政宏、张建华、刘显忠、刘祖熙等学者为代表的第一种观点认为,俄国就此由封建君主制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主要表现为沙皇制度开始依赖资产阶级,国家制度在立法和行政领域实行变革,国务会议具有资产阶级代议性质,国家制度构成发生重大变化^⑥。刘显忠(《试论第三届国家杜马》)还强调,第三届国家杜马的设立是俄国君主立宪政体步入正轨的开始。第二种观点认为,专制制度并未发生实质变化。孙成木等指出,虽然俄国建立了国家杜马,但政治制度本质并未发生变化,俄国也不是资产阶级君主制国家。李春隆、姜喆进一步指出,俄国虽由专制体制转向二元君主立宪体制,但沙皇接受立宪

① 姚海:《19世纪俄国革命激进主义及其根源》,《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3年第3期,第78~87页;赵士国:《19世纪俄国的恐怖主义及其批判》,《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第109~112页;周厚琴、曹维安:《俄国革命恐怖主义的源头:涅恰耶夫现象》,《西安文理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第39~43页。

② 姚海:《俄国第一次革命前夜的自由主义运动》,《铁道师院学报》1990年第4期,第1~8页;王绍章:《19世纪下半期俄国社会斗争中的“第三种人”》,《俄罗斯研究》2003年第3期,第88~91页。

③ 张建华:《资产阶级在俄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世界历史》1992年第1期,第21~29页。

④ 叶艳华:《俄国社会革命党与1905年革命》,《西伯利亚研究》2006年第3期,第92~95页。

⑤ 张广翔:《1905~1907年前俄国的历史选择》,《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0年第2期,第68~76页。

⑥ 王清和:《从无限专制制度到改行君主立宪》,《世界历史》1986年第5期,第11~20页;祝政宏:《俄国“六三政体”的彻底崩溃》,《新疆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第64~72页;刘显忠:《试论第三届国家杜马》,《史学集刊》1997年第3期,第63~68页;刘祖熙:《试论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障碍机制》,《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第131~132页。

受形势所迫,仍居国家权力主导地位,并将国务会议作为自己与国家杜马间的缓冲器^①。实际上分歧产生的根源在于,学者们对沙皇权力受限和资产阶级君主制发展程度,国务会议与国家杜马之间的关系看法根本不同。第三种观点(如张德敬)认为,自1861年改革后,贵族资产阶级化,资产阶级贵族化,俄国专制制度发生质变,迅速向资产阶级君主制演变。

2. 二月革命。

1980年代和21世纪初,中国学者十分关注此次革命,尤其是革命爆发的原因,并将二月革命视为十月革命的前奏和基础。

传统观点认为,俄国本是帝国主义各种矛盾的集合点,是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一战使俄国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加剧了国内经济危机,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社会各种矛盾空前激化,革命情绪不断高涨;战争期间,布尔什维克党坚决执行列宁的革命路线,在群众中做了大量宣传和组织工作,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而斗争;经过布尔什维克党的教育和领导,工农群众反对战争、反对沙皇的革命运动迅速发展,革命形势一触即发。

近年来,中国学者在研究二月革命的原因时有三个新动向。一是关注革命前资产阶级和上层贵族的作用,考察政府面临的统治危机。祝政宏、姚海、杜立克等认为,国家杜马中的自由主义反对派激烈抨击政府,拉斯普庭和“宫廷党”对国家事务的干预活动日益猖獗,致使王朝中间力量态度分化,部分贵族主张实行君主立宪^②。二是肯定立宪民主党在革命中的作用。苏联学者往往对其持否定态度,姚海则认为该党本质上主张改良、反对革命,在革命爆发后阻止它深入,但与政权的矛盾以及利用革命运动向政府施压的策略,又加速了革命爆发和沙皇政权崩溃^③。三是考察引发革命的长、中和短期因素。姚海认为,革命是俄国现代化道路矛盾性和资本主义文化与封建宗法制文化冲突对抗的结果。俄国现代化进程的结构失衡造成的系统性危机,是导致俄国革命的前提;1905年革命迫使沙皇政权进行改革,但斯托雷平体制的失败加剧了危机;一战激化了既有矛盾,一系列事件终将俄国引向革命^④。此外,针对二月革命过程中的推动力量,姚海肯定了国家杜马在迫使沙皇退位、加速专制制度瓦解、成立临时政府等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黄秋迪探讨了革命时期西伯利亚公共安全委员会的由来与影响,认为其接管沙皇政权、维护社会秩序,保证了革命在西伯利亚地区的顺利完成^⑤。

3. 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二个无产阶级政权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引起了世界各国学者的强烈关注。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学界常在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日时,集中介绍十月革命的基本知识和重要意义。195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开始关注十月革命对中国尤其是对中国革命、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中国工人阶级的影响。198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既关注十月革命的前提、动力、特点、性质和意义,还从史学史角度揭示研究的未来方向。十月革命研究是学科交叉的产物,历史学、政治学、国际关系等学科,国际共运史、世界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等分支,均对其十分关注。鉴于中国学界的当前情况^⑥,现就十月革命原因方面的研究情况和未来研究方向作简要介绍。

-
- ① 孙成木:《俄国国家杜马的形成及其实质》,《世界历史》1983年第6期,第55~65页;李春隆、姜喆:《20世纪初俄国政治制度透析》,《东北亚论坛》2008年第6期,第122~125页;姜喆:《1905~1906年的俄国国务会议改革》,《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第103~106页。
- ② 祝政宏:《二月革命前俄国上层贵族的离析和动摇》,《新疆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第81~89页;姚海:《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俄国自由主义运动》,《铁道师院学报》1995年第1期,第66~72页;杜立克:《俄国自由主义反对派与1917年二月革命》,《内蒙古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第46~52页。
- ③ 姚海:《俄国立宪派政党与二月革命》,《铁道师院学报》1989年第21期,第31~38页。
- ④ 姚海:《1917年俄国革命的根源》,《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4期,第69~74页。
- ⑤ 姚海:《论俄国二月革命中的国家杜马及其作用》,《黑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第23~26页;黄秋迪:《试论二月革命时期西伯利亚的公共安全委员会》,《西伯利亚研究》2008年第6期,第75~78页。
- ⑥ 参见孙凌齐:《国内外关于十月革命研究综述》,《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年第5期,第149~153页;吴恩远:《十月革命与俄国现代化进程——兼评当前十月革命研究中的争论》,《历史研究》2007年第5期,第22~34页。

第一,关于十月革命的原因。

中国学者普遍认为,十月革命前经济、政治、阶级和国际条件等主客观因素十分充分,十月革命具有必然性,其基本观点是:(1)俄国已经具有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1861年改革后,俄国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俄国帝国主义具有明显军事封建色彩。(2)俄国成为各种矛盾的集合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远远落后于美、德、英、法;对外国资本严重依赖,俄国成为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帝国主义各种矛盾在俄国表现得特别突出,如垄断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沙皇专制制度同人民大众的矛盾、大俄罗斯民族同各少数民族的矛盾、俄国帝国主义同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和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矛盾等。(3)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成熟。表现为俄国无产阶级队伍不断壮大,革命性较强,集中程度高,有比较成熟的政党,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能够根据具体情况制定正确的革命策略;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贫苦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4)一战的影响。俄国在战争中接连失利,国内经济濒于崩溃,激起全国各地不断爆发革命运动,革命潮流冲击着沙皇专制统治,革命时机成熟。一战削弱了帝国主义,使无产阶级有可能在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突破而取得革命的成功。也有学者对十月革命的经济前提提出质疑。比如,沈永兴认为十月革命前物质基础尚未成熟,俄国资本主义虽然有所发展,但仍是较为落后的农业国,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文化先决条件^①。吴恩远《〈十月革命与俄国现代化进程〉》等还采用现代化理论阐释十月革命的必然性,认为十月革命是俄国现代化进程矛盾的必然反映。社会经济的落后,要求俄国尽快融入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潮流;沙皇制度是实现现代化的最大障碍;国内外不可调和的矛盾激起社会各阶层的反抗,是革命的直接原因。

中国学者同样密切关注十月革命的推动力量。柳植、夏景才、陈之骅等称赞广大人民群众思考理性、列宁在其基础上选择正确。徐天新、钱茂堂、陈之骅等强调布尔什维克党的农民政策和统一战线发挥了重大作用^②。旅俄华工和犹太人作用也引起一定关注。李显荣、李玉贞、李永昌、张建华均认为十月革命准备期间,旅俄华工加入赤卫队,为创立苏维埃政权而英勇奋斗。后者还指出,这一举动改变了俄国数个世纪以来形成的、负面和扭曲的中国形象,促进了现代中国形象在俄苏的形成^③。郭宇春则肯定了1890年代至十月革命期间,大批犹太工人和青年学生在俄国革命运动中的出色作用^④。

中国学者还强调二月革命对十月革命的影响,认为二月革命虽然推翻了沙皇制度,结束了俄国的君主专制统治,但并未满足人民要求,没能解决和平、土地、面包、立宪会议等问题;七月事件和临时政府的白色恐怖活动猖獗,都为布尔什维克党人争取群众和准备夺取政权创造了条件^⑤。还有学者注意到村社制度与十月革命的关系,认为19世纪以来农民反对村社束缚、争取独立发展的斗争为十月革命创造了经济与文化条件,而维护村社的斗争则创造了政治条件^⑥。

第二,未来的研究方向。

中国学者的十月革命史研究,成就与不足并存。张建华认为研究具有强烈政治化倾向,常以列宁和斯大林的表述平息有关革命的性质、意义和影响的争论,并深受国际共运史和科学社会主义史研究模式的影响。中国学者应在研究方法、角度、资料建设等方面有所创新,应从学术本身关注这场革命,尤其关注革命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俄国边远地区的影响,关注政治力量变化和居民政治情绪,并尝试用文明史观阐释革命进程等。邵丽英还建议,不妨“只求其有无真伪而不论其是非对错”,考证

① 沈永兴:《谈谈十月革命的前提和列宁的贡献》,《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4期,第11~12页。

② 徐天新:《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革命准备时期的农民政策》,《世界历史》1981年第6期,第12~18页;陈之骅:《十月革命的必然性和历史意义》,《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4期,第4~10页。

③ 张建华:《旅俄华工与十月革命前后中国形象的转变》,《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1期,第228~233页。

④ 郭宇春:《犹太人与俄国革命运动》,《黑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第46~50页。

⑤ 夏景才:《试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和特点》,《东北师大学报》1984年第3期,第58~65页;孙成木:《对十月革命评价的一点认识》,《世界历史》2008年第2期,第127页。

⑥ 金雁:《村社制度、俄国传统与十月革命》,《陕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3期,第65~74页。

史料真伪,探究事实,分析事件前因后果,并从新的叙述角度考察传统历史问题^①。

20 世纪初俄国接连发生的三次革命,在中国俄国史研究的发展历程中留下深深烙印。起初,革命引发中国的政客和学者对俄苏的高度关注,推动了中国俄国史学科的诞生。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学者以马克思主义为依据,大力研习俄国革命史,认为革命前尤其是亚历山大二世改革后,俄国处于全面危机当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阶级与阶级之间矛盾尖锐,革命力量蓬勃发展。自 1980 年代末开始,中国学者在探讨革命发生的原因时,逐渐用现代化理论代替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俄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进程。

中国学者在俄国现代化开始时间这一问题上各执一词,或以彼得一世改革为起点,或视亚历山大二世改革为发端。也正因如此,18 世纪开明专制、19 世纪上半期政治制度以及 1861~1917 年间俄国历史进程才均被不同程度地探讨,其中尤以帝俄最后 60 年现代化进程最为瞩目。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俄国史研究的本质正是挖掘俄国现代化失败和革命的根源。为此,中国学者必须强烈关注亚历山大二世改革、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村社制度、城市化、斯托雷平改革、维特经济政策、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等问题,分别考察俄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现代化进程。

中国学者在研究俄国现代化进程时,已间接或直接揭示了俄国革命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中国学者普遍认为,俄国经历了在外力作用下的赶超型现代化进程,其政治和法律条件不完备,加速发展的工业与落后的农业关系失衡,城市化进程缓慢,农民等级封闭性强,东正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冲突,造成严重的社会矛盾,国家与社会日益疏远。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冲突与矛盾成为革命的温床,当其他条件成熟时,20 世纪初俄国革命终于纷至沓来。然而,革命并未消除俄国现代化进程的诸种弊端,苏联时期现代化进程又尝尽了苦果,最终还是没能逃脱国家解体的厄运。

七 回顾与展望

百年以来,中国俄国史研究日趋繁荣,成果数量大幅增加,选题较为广泛深入,史学理论更新及时,中外交流日益密切。这些成就的取得实属不易,然而俄国史研究同样存在很多缺陷。中国学者受苏联学者影响很大,而苏联史学本身便存在诸多弊病,尤其涉及俄国社会转型的重大历史问题时更是如此。加上中国某些特殊时期的政治和学术环境,造成俄国史研究经历了艰难的“去意识形态化”和“去政治化”过程,影响了俄国史研究的学术积累。

目前,中国俄国史研究本身也存在诸多问题,比如通史教材未充分利用近年来研究成果,译介论著力度不够等,其中选题集中问题最为严重。俄国古代史、中世纪史和 19 世纪上半期历史进程很少受到关注,社会史和史学史领域有许多问题几乎处于研究边缘,制约了俄国史研究的整体水平。不过,从总体而言,中国俄国史研究面临的最严峻问题在于后备人才储备不足,人才培养形势不容乐观。

中国俄国史研究起步晚,队伍小,基础薄弱,在发展初期又因中苏关系破裂和“文化大革命”而停滞。新中国成立后留苏的一批学者,在中苏关系破裂后基本改行,从事教学和科研的少数学者则受各种政治运动牵累。高考制度的恢复和改革开放政策的施行,使学者有机会重新投入到学术研究当中,可惜专业知识荒废多年,大都错过了科研黄金年龄。当国内重新培养俄国史人才时,世界局势又发生了变化。先是西欧和日本崛起,1980 年代末 1990 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世界朝政治多极化的方向发展。美国史、西欧史和日本史研究与新的“现实需要”相适应,吸引了国家和大批人才的热切关注。与此同时,俄罗斯转向西方,政治动荡,经济萧条,同美国史、英国史和日本史相比,俄国历史问题已失去往昔的光芒,中国国内俄语教育也因此受到很大影响。俄国留学政策的变化也制约了中国俄国史研究的整体发展。苏联十分重视外国人才培养工作,苏联解体后情况却发生变化。美国、英国、日本凭借良好的发展形势、便利的语言条件和优厚的留学政策,吸引了大量优秀学生前往深造。而俄罗斯则十分注重眼前经济利益,轻视对外国人才的培养,公费留学生招生名额和奖学金项

^① 张建华:《十月革命史学四题——史学史和方法论的思考》,《俄罗斯文艺》2007 年第 4 期,第 18~21 页;邵丽英:《叙述创新与问题转换——俄国“十月革命”再思考》,《俄罗斯研究》2011 年第 3 期,第 48~77 页。

目少,近年来的通货膨胀使自费留学费用更高。中国学者“闭门造车”现象发生的几率大大增加。

与俄国史相比,苏联史、中苏关系史以及当代俄罗斯问题研究更有吸引力。社会需求不足,就业前景暗淡,使高素质、潜力大的研究人员望俄国史而却步,转而投向世界史研究的中心学科。然而,俄国史研究的兴衰恰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才的素质和后备人才的培养。国内第二批学者逐渐退居二线,接受专业史学训练、掌握基本研究方法的第三批学者虽逐渐成长起来,但短时间很难独当一面,“新老断层”现象初露端倪,未来10年之内暂且不会有太大的消极影响,但10年乃至20年之后,中国俄国史研究百年来的学术积累极有可能付诸东流。

中国俄国史学科的发展,离不开国家和学者的共同努力。健全的人才培养机制,充足的科研经费,便利的留学政策,无疑能保障研究人员的数量和素质,有利于优秀成果的产出和人才的引进。同时,学者应注意提高自身修养,力争兼有才、学、识、德等“史学四长”;增强问题意识,振叶寻根,观澜索源,拓宽学术视野,密切留意俄国和西方的史学成果,将新老课题一并做深做宽;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将中国史学传统与世界史学遗产充分结合,打造有中国特色的俄国史学科体系。

“生也有涯,无涯惟智。逐物实难,凭性良易。傲岸泉石,咀嚼文义。”衷心希望中国俄国史研究能脚踏实地,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收稿日期 2015-07-26

作者张广翔,历史学博士,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周嘉滢,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吉林,长春,130012。

Russian History Studies in China over the Past Century

Zhang Guangxiang and Zhou Jiaying

Keywords: Russian history studies; reform and opening-up; modernization theory; reform; revolution

Abstract: Russian history studies in China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osperous, especially from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on, the number of research results increased markedly, research contents were more extensive and thorough, the new historiography theories were employed timely, academic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abroad were built closer. With the modernization theory introduced, the study of Russian modernization is becoming the mainstream trend of Russian history studies in China. Chinese scholars not only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the origin of Ancient Russia, but also have always been very keen on other issues, such as the great reforms, industrialization,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village community, urbanization etc. to search for the origins of three Russian Revolutions. Although Russian history studies in China have made gratifying achievements,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for example, lacking of academic accumulation, centering on narrow fields, facing a less optimistic situation of talent cultivation etc. The subject of Russian history in China can not develop without the great efforts made by the state and the scholars.

【责任编辑 池 豫】